



澳門大學
UNIVERSIDADE DE MACAU
UNIVERSITY OF MACAU

文艺学与 古典文学论稿

龚刚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澳門大學
UNIVERSIDADE DE MACAU
UNIVERSITY OF MACAU

文艺学与 古典文学论稿

龚刚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艺学与古典文学论稿 / 龚刚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3. 11
ISBN 978 - 7 - 5161 - 3564 - 8

I. ①文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文艺学—文集②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研究—文集 IV. ①I0 - 53②I206.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66483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史慕鸿
责任校对 李 莉
责任印制 李 建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 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3.75
插 页 2
字 数 215 千字
定 价 3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 010 - 64009791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弁 言

《易》曰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人文之学，博大精深，俯仰天人之际，吐纳古今之变。治人文学者，横通哲艺，稍窥文史，不唯志趣之所之，亦学理使然也。观乎古之通人，超拔乎诸科藩篱之外，陶然于志道游艺之乐，诚治学之有境界者。余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本书分上、中、下编，上编为哲艺会通，分别探讨经、子、集之“心史”本质与经学、哲学著述之文学价值，《史记》笔法之哲学性与文学性，“易之三名”所彰显之修辞学现象及其哲学依据，海德格尔诗学命题“诗意地栖居”与庄子哲学命题“逍遥游”之相通性。

中编为跨文化文论研究，分别以钱锺书所谓“二西之书”（即印度、西方之书）通中土之艺，细究“诗味”、“通感”、“速度”、“距离”诸诗学范畴，末篇详论诗话体之范式意义。

下编为古典文学新论，首篇辨析两首《鹊踏枝》词，其后分论李煜词、陆游诗、郑观应诗、明四大奇书之《三国演义》、古典戏曲双璧之《牡丹亭》，或评辞章，或究人品，或考词义，皆一管之见，非通览之作。其中以还原陆游形象，重审郑观应诗艺，推敲《牡丹亭》“香山香里巴”注释为较有新意者。钱锺书尝谓，中国古典文学为其“专业”，比较文学为其“余兴”，本书则由比较诗学（跨文化之文论研究）及于中国古典文学，盖因国学国粹终为治比较文学者之本也。

以师承而言，本书颇多祖述钱锺书之作，计有《“经子集皆心史”与“经子笔趣”申说》、《〈史记〉笔记的哲学性与文学性》、《“易之三名”的悖反修辞及其哲学依据》、《“通感”与中西文学》、《“速度”与

中西文学》、《诗话与西化》、《陆游形象之还原》凡七篇，与余之旧著《钱锺书：爱智者的逍遥》相映发。钱锺书集智者、学人、文士于一身，其学出入文史哲艺，打通古今中西，熔问道、谈艺于一炉，启人良多。钱基博日记有云：“儿子锺书能承余学，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，以章氏（章学诚——引者注）文史之义，抉前贤著述之隐。”本书或可谓私淑钱氏文史之义乎？敬祈方家正之。

是为序。

壬辰初秋濠镜龚刚谨识

目 次

弁言	(1)
----------	-----

上编 哲艺会通

“经子集皆心史”与“经子笔趣”申说	(3)
《史记》笔法的哲学性与文学性	(26)
“易之三名”的悖反修辞及其哲学依据	(33)
“逍遥游”与“诗意地栖居” ——庄子哲学与海德格尔诗学之会通	(49)

中编 跨文化文论研究

“味”与中印古典诗学	(67)
“通感”与中西文学	(81)
“速度”与中西文学 ——以苏轼诗文与《荷马史诗》之比较为中心	(86)
欣赏的“距离”与中西文艺	(116)
诗话与西化	(123)

下编 古典文学新论

两首《鹊踏枝》异同辨	(155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李煜词风之转变	(159)
陆游形象之还原	(163)
郑观应的诗艺与诗观	(180)
《三国演义》毛宗岗批语申说一题	(196)
《牡丹亭》“香山岙里巴”注释献疑	(201)
小议青春版《牡丹亭》	(209)

哲艺会通

“经子集皆心史”与“经子笔趣”申说

钱锺书在《管锥编》中指出，“盖修词机趣，是处皆有；说者见经、子古籍，便端肃庄敬，鞠躬屏息，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”。^①此说提醒研究者注意经学家、哲学家的修辞与笔趣，与其“史蕴诗心”^②、“古史即诗”^③等说相呼应，显现出与清代阮元等截然对立的以经部、史部、子部典籍为文学研究资源的治学立场及其“经、史、子皆文章”的学术观念^④。此外，他还明确提出了“经、子、集皆心史”的观点^⑤。两者结合，充分彰显出钱锺书主张从“文”、“史”两个角度打通四部典籍的治学思想。本文拟对这一治学思想的内涵、依据及其对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说、袁枚的“六经皆文”说的传承发展略加疏说。

一 “章氏文史之义”与钱锺书所谓“文史通义”

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一则日记中不无得意地记述道：

① 钱锺书：《管锥编》（第二册）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461页。

② 钱锺书：《谈艺录》（补订本）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363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38页。

④ 傅道彬《“六经皆文”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》一文（《文学遗产》2010年第5期）结合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说与钱锺书的“古史即诗”说，推演出钱锺书的治学思想中应当有“六经皆诗”的观念这一论点，但未提及钱锺书的“经子笔趣”说。

⑤ 《谈艺录》（补订本），第266页。

儿子锺书能承余学，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，以章氏（章学诚——引者注）文史之义，抉前贤著述之隐。发凡起例，得未曾有。每叹世有知言，异日得余父子日记，取其中有系集部者，董理为篇，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，当继嘉定钱氏（钱大昕——引者注）之史学以后先照映，非夸语也。^①

钱锺书本人在《谈艺录》最后一则中阐发“章氏文史之义”说：

学者每东面而望，不睹西墙，南向而视，不见北方，反三举一，执偏概全。将“时代精神”、“地域影响”等语，念念有词，如同禁咒。夫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所谓一哈之水，固可以揣知海味；然李文饶品水，则扬子一江，而上下有别矣。知同时之异世、并在之歧出，【补订一】于孔子一贯之理、庄生大小同异之旨，悉心体会，明其矛盾，而复通以骑驿，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。^②

这段话表明，在钱锺书看来，唯有不囿限于“时代精神”、“地域影响”等范畴而注重东西之理、南北之学的“打通”（“通以骑驿”），才可“语于”章学诚所谓“文史通义”。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钱基博对其子喜“以章氏文史之义，抉前贤著述之隐”的评价。

在《谈艺录》初版序言中，钱锺书介绍其治学思路与方法说：

凡所考论，颇采“二西”之书，“二西”名本《昭代丛书》甲集《西方要纪·小引》、《鮑琦亭诗集》卷八《二西诗》。以供三隅之反。盖取资异国，岂徒色乐器用；流布四方，可征气泽芳臭。故李斯上书，有逐客之谏；郑君序谱，曰“旁行以观”。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，每同《七音略序》所慨；而

^① 钱基博日记，1935年2月21日，见《钱锺书与近代学人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4页。钱基博日记毁于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未有文字存世。上引文出自钱基博《读清人集别录》的引言中，自记写于1935年2月20日，原载《光华大学》（半月刊）4卷6期，1936年3月。后被收入钱基博《中国文学史·附录·清代文学纲要》，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，第758页。

^② 《谈艺录》（补订本），第304页。

西来意即名“东土法”，堪譬《借根方说》之言。非作调人，稍通骑驿。^①

这段开宗明义的文字和上引《谈艺录》结语，一首一尾，遥相呼应，凸显出钱锺书对“章氏文史之义”的推崇，主要着眼于章学诚治学贵“通”的理念，也就是他的“会通”精神。但章学诚的“会通”精神与钱锺书在此处所作的阐发，无论在立论背景还是宗旨取向等方面，均有差别。

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的开篇及《答客问》相继指出：

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；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^②

嗟乎！道之不明久矣。《六经》皆史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盖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”然则典章事实，作者之所不敢忽，盖将即器而明道耳。其书足以明道矣，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，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。道不明而争于器，实不足而竞于文，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，相去不能以寸焉，而世之溺者不察也。太史公曰：“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。”当今之世，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！^③

《报孙渊如书》又说：

愚之所见，以为盈天地间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学，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。子、集诸家，其源皆出于史，末流忘所自出，自生分别，故于天地之间，别为一种不可收拾、

① 《谈艺录·序》（补订本），第1页。

② （清）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易教上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页。

③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答客问上》，第253页。

不可部次之物，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。此种议论，知骇俗下耳目，故不敢多言；然朱少白所钞鄙著中，亦有道及此等处者，特未畅耳。^①

这三段话明诏大号地提出了“六经皆史”亦即“经”乃三代“典章事实”^②的观点，历来论者甚多，且歧见迭出，刘巍《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说的本源与意蕴》对此作了详尽梳理^③。本文拟从“会通”精神的角度，简要概括其说宗旨。

首先，在图书分类的层面上，章学诚力主以“班《志》刘《略》”之法贯通“著作之林”，反对“四种门户”之见。他自述《文史通义》的旨趣与方法说：“思敛精神，为校讎之学，上探班、刘，溯源官礼；下该《雕龙》、《史通》，甄别名实，品藻流别，为《文史通义》一书。”^④在《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》中，他主张“仿班《志》、刘《略》，标分部汇，删芜擷秀，跋其端委，自勒一考，可为他日馆阁校讎取材”^⑤。对于《七略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六分法（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术数、方技）流为四部分类法，章学诚在《上晓征学士书》中提出了尖锐批评：“学术之歧，始于晋人文集，著录之舛，始于梁代《七录》，而唐人四库因之。”^⑥所谓“唐人四库”，是指唐代将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的四部分类法，也就是章学诚所谓“四种门户”之见。在章学诚的时代，四部分类法因获乾隆圣谕首肯而确立了文化霸权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清廷开四库全书馆校核《永乐大典》，乾隆确定他日采录成编，题名《四库全书》。谕中有曰：“朕意从来四库书目，以经、史、子、集为纲领，裒辑分储，实古今不易之法。”^⑦圣谕以四部分类法为“古今不易之法”，而章学诚却认为四部分

①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报孙渊如书》，第721页。

② 参阅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经解上》“古之所谓经，乃三代盛时，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”之说，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77页。

③ 刘巍文见《历史研究》2007年第4期。

④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与严冬友侍读》，第706页。

⑤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》，第857页。

⑥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上晓征学士书》，第649页。

⑦ （清）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首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1页。

类法加剧了“著录之外”，难怪他在前述致孙星衍（渊如）的信中感叹道，“此种议论，知骇俗下耳目，故不敢多言”。从章学诚打通经史的眼光来看，《七略》中六艺、诸子二略兼收儒家之书，且六艺略春秋类附列史书，未严经史之别，深合其打通经史、以史明道的著述之志，而四部分类法“自生分别”，严经史之别，自然不合他的心志，所以他才力抗时流，崇《七略》而黜《四库》。

其次，在治史目的的层面上，章学诚力主“即器而明道”、“好学而知意”，也就是通观“古今载籍”以明“史意”、以通“大道”，从而达到“通经致用”的目的。章学诚明确指出，“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，更无别出著述之道，亦已明矣”^①。“六经”之所以为“史”，正因为记载了上古三代“政教典章人伦日用”之“实”。治史者应撇开严经史之别的门户之见，取“古今载籍”精思深究，以收由史明道、以益“世教”之功。关于这一点，章学诚在自述其《文史通义》的“著述之道”即其缘起和立意时，说得很明白：

故今之学士，有志究三代之盛，而溯源官礼，纲维古今大学术者，独汉《艺文志》一篇而已。……故比者校讎其书，申明微旨，又取古今载籍，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，为之商榷利病，讨论得失，拟为《文史通义》一书。分内外杂篇，成一家言。^②

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，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，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。此予《文史通义》所为作也。^③

学诚读书著文，耻为无实空言，所述《通义》，虽以文史标题，而于世教民彝，人心风俗，未尝不三致意，往往推演古今，窃附诗人之义焉。^④

①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原道》，第101页。

②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上晓征学士书》，第648页。

③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〈和州志·志隅〉自叙》，第887页。

④ 《上尹楚珍阁学书》，《章氏遗书》卷二九，民国嘉业堂本，不注页码。

概而言之，章学诚是在“以史明道”、“通经致用”的立场上，主张突破经、史的界限，反对“四种门户”之见。他的“会通”精神在此处主要体现在通观“自六艺以降迄于近代”之“古今载籍”，以明“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”之道，所以他说，“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，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，庶几有立而能言”^①。从其“成一家言”、“耻为无实空言”、“好学知意”等说，及其重“六艺”、关注“官礼之变”、“乐之变”等特点可见，司马迁的通观古今以明“王道”及变化之迹的史学理念对其影响甚深。司马迁治史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为宗，他又称许《春秋》说：“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……王道之大者也。”对于“六艺”的价值，司马迁亦概而言之曰：“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”^②两相对照，无论是立意、论据还是措词，章学诚皆有取于司马迁。章学诚盛赞班、马曰：“史氏继《春秋》而有作，莫如马班，马则近于圆而神，班则近于方以智也。”^③可见他对《史记》心仪之深。

反观钱锺书所阐发的“文史通义”，以打通“东西之理”、“南北之学”为指归，与章学诚的本意似有出入。不过，钱锺书对“章氏文史之义”亦有深究，下文将略加申说。

二 钱锺书对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说的考论与拓展

钱锺书在辨析章学诚、袁枚治学思想同异时，引述了袁枚《小仓山房文集·史学例议序》“古有史无经”之说：

古有史而无经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今之经，昔之史也；《诗》、

①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诗教下》，第59页。

② （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297页。

③ 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·书教下》，第36页。

《易》者，先王所存之言；《礼》、《乐》者，先王所存之法。其策皆史官掌之。^①

钱锺书下断语说，袁枚此说即“《文史通义》‘六经皆史’之说也”^②。在钱锺书看来，章学诚虽然“痛诋子才，不遗余力”，但前者之“论学大义”与后者之“说诗要指”，常常“不谋自合”。^③两人皆持“六经皆史”观，即是例证。

对于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说的渊源，钱锺书论述道：

按“六经皆史”之说，刘道原《通鉴外纪序》实未了了。……王阳明《传习录》卷一、王元美《艺苑卮言》卷一、胡元瑞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二、顾亭林《日知录》卷三，皆先言之。而阳明之说最为明切。略谓：“以事言曰史，以道言曰经。事即道，道即事。《春秋》亦经，五经亦史。《易》是庖牺之史，《书》是尧舜以下史，礼乐即三代史，五经亦即是史。史以明善恶，示训戒，存其迹以示法”云云。“《春秋》亦经”，暗合董子《春秋繁露》之绪：“五经亦史”，明开实斋《易教》上之说。^④

钱锺书又指出，王阳明的“五经亦史”之说与程、朱之论，则“如炭投冰”^⑤：

《程氏遗书》卷二上云：“《诗》《书》载道之文，《春秋》圣人之用。五经之有《春秋》，犹法律之有断例。《诗》《书》如药

① 《谈艺录》（补订本），第262页。参见袁枚《随园随笔》卷二十四《古有史无经》：“刘道原曰：历代史出于春秋。刘歆《七略》，王俭《七志》，皆以《史》，《汉》附于《春秋》而已。阮孝绪《七录》才将经、史分类。不知古有史无经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皆史也；《诗》、《易》者，先王所传之言；《礼》者，先王所立之法，皆史也。”《袁枚全集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414页。

② 《谈艺录》（补订本），第262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261—262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263—264页。

⑤ 同上书，第264页。

方，《春秋》如用药治疾。”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一云：“或问《左传》疑义。曰：公不求之六经《语》《孟》之中，而用功于《左传》；《左传》纵有道理，能几何。吕伯恭爱与学者说《左传》，尝戒之曰：《语》《孟》六经多少道理不说，恰限说这个；纵那上有些零碎道理，济得甚事。”《语类》卷一百十六训渊、卷一百十八斥郑子上、卷一百二十答器远等均申此意。盖以经与史界判鸿沟也。^①

这段引文的着落在“盖以经与史界判鸿沟也”这一断语。照程、朱的立场，《春秋》与作为其传文的《左传》有等级之别，《春秋》为“圣人之用”，蕴含着“多少道理”，《左传》里只是些“零碎道理”，“济得甚事”。这和章学诚既着眼于消弭经史鸿沟，又着眼于提升史学地位的以经为史的立场，的确势如冰炭。

在梳理了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说的渊源，辨析了其与程朱尊经轻史的立场之别后，钱锺书进而指出：

程子亦以史为存迹示法，而严于阳明者：存迹示法，法非即迹，记事着道，事非即道。阳明之意若谓：经史所载虽异，而作用归于训戒，故是一是二。说殊浅陋。且存迹示法云云，只说得事即道，史可作经看；未说明经亦是史，道亦即事，示法者亦只存迹也。尝试言之。道乃百世常新之经，事为一时已陈之迹。《庄子·天运》篇记老子曰：“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迹哉”；《天道》篇记，桓公读圣人之书，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，道之精微，不可得传。《三国志·荀彧传》注引何劭为《荀彧传》，记彧谓：“孔子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，六籍虽存，固圣人之糠粃”云云。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，乃道家之常言。六经皆史之旨，实肇端于此。^②

① 《谈艺录》（补订本），第264—265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65页。